SSOAR

Open Access Repository
www.ssoar.info

######”#########“####”###########

Abb, Pascal; Swaine, Robert; Jones, Ilya

Veröffentlichungsversion / Published Version
Arbeitspapier / working paper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in Kooperation mit / provided in cooperation with:
Hessische Stiftung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HSFK)

Empfohlene Zitierung / Suggested Citation:
Abb, P., Swaine, R., & Jones, I. (2021). *######”#########“####”###########*. (PRIF Reports, 3). Frankfurt am Main: Hessische Stiftung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https://nbn-resolving.org/urn:nbn:de:0168-ssoar-75568-6

Nutzungsbedingungen:
Dieser Text wird unter einer CC BY-ND Lizenz (Namensnennung-Keine Bearbeitung)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Nähere Auskünfte zu den CC-Lizenzen finden Sie hier: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4.0/deed.de

Terms of use:
This document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a CC BY-ND Licence (Attribution-NoDerivative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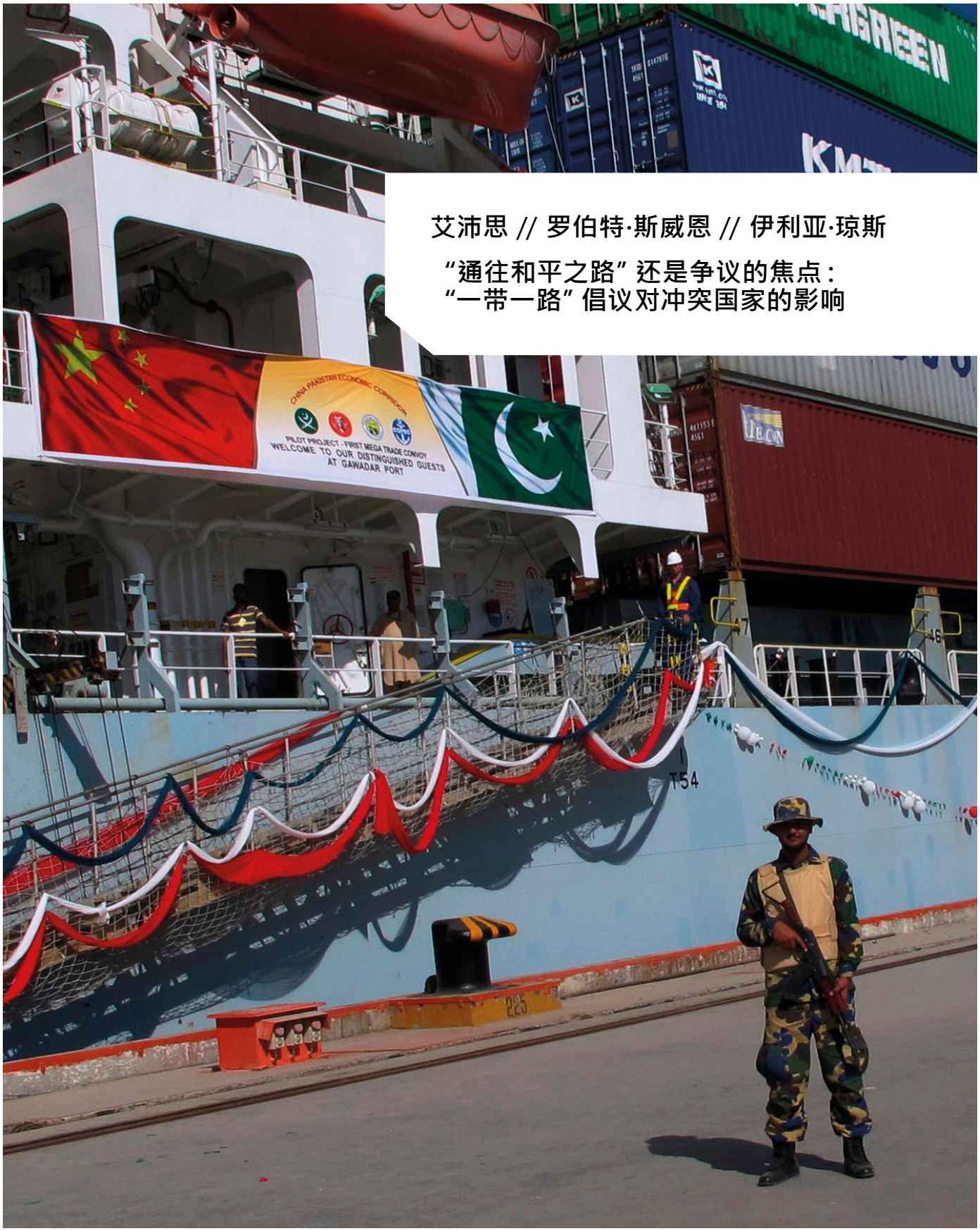
gesis
Leibniz-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Mitglied der
Leibniz-Gemeinschaft

3/2021

PRIF REPORT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 LEIBNIZ-INSTITUT HESSISCHE STIFTUNG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艾沛思 // 罗伯特·斯威恩 // 伊利亚·琼斯

“通往和平之路”还是争议的焦点：“一带一路”倡议对冲突国家的影响

PRIF Report 3/2021

“通往和平之路”还是争议的焦点：“一带一路”倡议对冲突国家的影响

艾沛思 // 罗伯特·斯威恩 // 伊利亚·琼斯

出版信息

本报告是与“更安全世界” (Saferworld) 合作编写，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合作翻译。

LEIBNIZ-INSTITUT HESSISCHE STIFTUNG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HSFK)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PRIF)
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

Cover:
Pakistan Navy soldier stands guard while a loaded Chinese ship prepares to depart at Gwadar port. Muhammad Yousouf, picture alliance/AP Photo.

Text licence:
Creative Commons CC-BY-ND 4.0 (Attribution/NoDerivatives/4.0 International).
The images used are subject to their own licenses.

Correspondence to: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PRIF)
Baseler Straße 27–31
D-60329 Frankfurt am Main
Telephone: +49 69 95 91 04-0
E-Mail: abb@hsfk.de, rswaine@saferworld.org.uk, ijones@saferworld.org.uk
https://www.prif.org

ISBN: 978-3-946459-64-4

摘要

自2013年中国宣布建设“一带一路”以来，这一重要倡议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此类关注焦点涵盖了其对从经济一体化到地缘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影响。然而，尽管这一倡议相关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高度脆弱和容易发生冲突的环境，但“一带一路”项目所涉及的和平与安全影响却较少受到关注。

如本报告所示，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也以多种方式对当地冲突动态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其表现包括提供发展红利和经济机会，在日常生活中展现政府权力，以及项目建设受制于地方政治利益或安全化措施。其中一些影响是积极的，并为那些原本很难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开启了新的发展前景。其他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并造成了新的怨怼和紧张，特别是“一带一路”项目的惠益和成本，在具有相互冲突历史的群体之间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体现得尤为明显。本报告旨在阐明“一带一路”投资与当地冲突动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就如何改进结果提供一些切实建议。

这一问题具有紧迫的意义，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早期实施中变得愈发重要。随着项目在冲突环境中不断落地实施，中国企业正在努力周旋应对各种相关问题。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成员国承受外部压力，并导致国内政治拉锯战。人们对负责执行“一带一路”项目的各国政府主管部门普遍缺乏信任，有时还加上了对中国影响的怀疑态度。在某些团体中，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触和反对已变得愈发强烈，项目本身也因此成为好战分子的攻击目标。应对这一挑战对于很多此类国家的未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本身至关重要。

该报告基于对四个特别容易产生冲突的“一带一路”国家的调查：巴基斯坦、缅甸、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干达。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冲突，有时甚至达到了内战的水平，并以持续的政治不稳定为特征。尽管存在这些阻碍它们获得外国投资和发展融资的不利先决条件，但这些国家仍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获得可观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规模从乌干达的约20亿美元到巴基斯坦的3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我们通过与当地专家和社会组织代表进行访谈（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访谈主要在线完成），结合对当地媒体、专家和利益攸关方出版物的观察结果进行分析，以及与本地和中国利益攸关方进行背景讨论，以此对“一带一路”建设对当地的影响展开了研究。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所有四个案例中，冲突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制这一结果通常是产生于响应国家层面利益而制定的规划，而规划对区域和本地社区的关注却较少。红利往往聚集在精英阶层和特权群体之中，弱势群体因此有在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掉队的风险。因此，要确保“一带一路”项目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更广泛接受和获得成功，取决于更好地与当地社区联系，增强冲突敏感性，提高项目透明度以及为对当地生计的不利影响提供充分适当的解决方案。这份报告虽然尚未进行全面的调查，对于我们后续旨在剖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受冲突影响国家影响的更大型研究项目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并展示了这一议题的现实意义。报告同时也呼吁包括中国、本地和国际行为者的各方加强合作，以确保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这也符合他们的共同长远利益。

目录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抱负与本地实施之间 1

二 争议、关切与冲突风险 3

三 冲突环境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一般性模式 4

四 “全天候”朋友与地方上的敌意：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建设 6

五 在复杂局面中寻求合作：缅甸的“一带一路”建设 11

六 多疑的邻居：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投资的看法 15

七 东非地带：陆锁国乌干达的“一带一路”投资 19

八 结论 22

参考文献 25

一, “一带一路” 倡议 : 全球抱负与本地实施之间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名义正式启动后，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显要的基础设施倡议。其名称中反映出的最初愿景是，通过建设横跨欧亚大陆的陆基新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围绕印度洋的一系列港口设施（“海上丝绸之路”），提升中国与世界的交通联系。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项目组合，其范围难以把握。这一最初以互联互通为主要使命的倡议已经成为一个汇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全球平台，而这些基建项目通常被划分和分散到几十个产业上。本报告列举的几个例子主要包括部分“一带一路”典型项目，比如巴基斯坦的一个大型新港口、缅甸的一个水电站、吉尔吉斯斯坦的采矿项目以及乌干达的道路工程项目。

“一带一路”项目之所以如此多样，主要源于“一带一路”作为开放平台的构想，许多不同的参与者可以将他们的项目附加到这个平台上，进而导致“一带一路”项目没有明确的定义。事实上，“一带一路”一词可以用于位于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任意基础设施项目，而且这些项目要么由中国资助，要么由中国参与建设（通常两者都是）。这也是我们在撰写这份报告时所采用的方法，以便尽可能多地包含材料和数据。这一定义让我们更容易了解“一带一路”的总体范围，而对于“一带一路”的不同估测往往存在很大争议。使用这种方法以及“中国全球投资追踪工具”(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Scissors 2019) 的最新数据得出，自“一带一路”国家加入这一倡议以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计约为3510亿美元，而其他的估算认为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建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1]

无论我们在计算“一带一路”投资时所涵盖的范围有多广，中国很明显已成为全球许多国家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提供者。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那样，中国公司对这一领域的风险接受度非常高，这使它们能够进入到其他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或西方开发机构不愿涉足的领域。影响“一带一路”构想的关键想法之一是对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的判断，这一缺口阻碍了当地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估计每年未满足的需求高达5000亿美元(Lin/Wang 2013)。为了填补这一缺口，中国可以利用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同时输出国内在该领域的过剩产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去”迈入新阶段。

然而，在国际观察家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很快就超越了经济和发展措施的范畴。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本人联系密切，以及他追求更具雄心的中国外交政策(Yan 2014)，大家很快就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即便在大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开始之前，一些观察家，尤其是美国的观察家，就开始怀疑“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主要目的是不是要将广袤的欧亚大陆变成中国的“腹地”，利用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来拉拢较小的国家，首先从经济入手，再进入政治层面(Fallon 2015, Ferdinand 2016)。这一臆测仍然在西方盛行，进而影响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并引发许多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对，导致意大利成为唯一正式加入

1 本报告的估算主要基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工具”不断更新至2020年底的数据，并限于交通、能源、公用事业和电信等四个行业的基建投资。

该倡议的西方大国。迄今为止，西方对“一带一路”最典型的分析仍然集中在地缘政治方面，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的长远尝试。为此，中国将继续坚持经济开放的自由计划但同时又寻求削弱与自由经济体系相对应的政治维度(Rolland 2017)。其他的观察家则更关注“地缘政治”的传统含义，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将如何改变中国的战略空间，即从不稳定的西部地区向欧亚前沿延展(Markey 2020)。随着越来越多与“一带一路”项目实施有关的信息被披露出来，最近的研究同时涵盖了对中国战略目标与多样化环境下的当地现实之间紧张关系，这种多样化环境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Hillman 2020)。

这类观点不能被轻易忽视。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家中如此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预示着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将从选择性地适应现有的全球秩序转向积极地重塑它(Swaine 2015)。中国建造的道路和桥梁确实将为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人类互动创造新的途径，而作为所有这些路线的交汇点，中国将(重新）成为 世界的政治中心。习近平主席本人也对此愿景寄予厚望，他宣示这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也将是此愿景的核心(China Daily 2017)。然而，人们在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目标和地缘政治影响时忽略了一点，即绝大多数已宣布和完成的项目将直接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政府加入“一带一路”并非出于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首要考虑，更重要的却是他们认为中国提供的基础设施将为他们实现各自的国内发展优先目标提供最好的契机。

最终建成的“一带一路”项目并非是在北京某个总部构想出来的；相反的，它们是各国政府及其支持者、中国融资机构和承包商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虽然“中国”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但“一带一路”倡议的广阔范围和开放程度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其中包括许多政府机构，主要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以及省级和市级政府；一系列国家和多边融资机构，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到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项目建设中寻求商业机会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的混合体；来自智库和学术界的顾问；其他从事国际交往和宣传的机构和组织；此外，许多普通人也被“一带一路”倡议承诺的机会所吸引。

在已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上述机构或个人与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体进行着广泛接触，这些行为体也利用这一机会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往往相互矛盾。因此，随着目标国家政治风向的转变和优先事项的重新评估，项目需要重新谈判。这在本报告涉及的国家中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暴力事件频发、政治不稳定、体制脆弱，有时还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有时，这些因素会导致项目进程与初衷大相径庭，甚至被彻底放弃。本报告力求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并为全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增添更多细微差别，展示它如何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本地化，并进而改变这些环境。

二, 争议、关切与冲突风险

除了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在发展中国家开辟中国主导的利益领域的地缘政治项目外，对其的批评通常集中在中国建设的基础设施及其背后融资等具体特征上。

最早的批评集中在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现有的环境可持续性跟踪记录上。这个批评引起了对二氧化碳高排放的能源生产和工业扩张、水资源重新定位和当地居民生计损失、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入侵物种扩散以及建筑活动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的关注(Ascensão et al. 2018)。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政府最早承认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在2019年推出了一项全面议程，旨在“绿化”“一带一路”倡议，并在项目融资中加大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所有主要的“一带一路”融资机构都致力于维护这些原则(Jahns et al. 2020)。然而，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散性、监管机构的能力限制以及受援国之间不一致的环境法规，此类标准的实际广泛实施仍难以实现(Hale, Liu and Urpelainen 2020)。

此外，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既定目标之一是刺激当地工业发展，但其建设和运营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仅限于少数中国承包商，其中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据中国国资委副主任称，国有企业投资额占“一带一路”投资总额的80%以上(China Daily 2019)。一个常见的抱怨是投标过程的封闭或不透明，这将国际竞争对手系统地拒之门外(EU Chamber of Commerce 2020)。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很少有机会参与项目实施，通常理由是它们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除此之外，无论项目为当地人创造了何种直接就业机会，几乎都是一些低技能、低薪和临时性的职位(Russell and Berger 2019)。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如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大型铁路扩建项目，如今包括了在中国高校针对当地员工进行的广泛培训计划(Chen 2020)，但效果仍有待观察。

“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也同样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尽管它主要具有商业性的本质，而非针对东道国的援助，但其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集中性使其与国际发展融资直接竞争，后者往往要求受援国致力于经济和政治改革(Dollar 2018)。与之相反，中国的贷款宣称“不附带任何条件”，这得到了中国官方“不干涉别国内政”立场的支持。因此，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贷款和中国开发融资的激增被视为削弱了西方国家制定的标准，并减轻了针对不遵守这些标准的国家的改革压力(Brautigam 2009, Benabdallah 2016)。

正是由于能大量获得来自中国的资本，许多成员国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引发了对这些安排的可持续性的担忧。据世界银行估计，三分之一的受援国将因“一带一路”合作框架而面临更大的债务脆弱性(Bandiera and Tsiropoulos 2019)。一些分析人士甚至指责中国从事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即明知债权国债务累累因而有违约风险，却仍然给予贷款，这只是为了利用必要的重组或债务减免来增加对债权国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指控被夸大了，同时也忽视了地方政治角色的作用，更忽视了对中国贷款坏账率的单纯解释，比如中国更愿意承担风险以及缺乏对当地环境条件的了解等(Acker, Brautigam and Huang 2020)。但债务可持续性确实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尤其是鉴于违约可能对当地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破坏性影响。

在强调受援国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机构作用的同时，对“债务陷阱”的驳辞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一带一路”项目的重大决策和整体发展规划主要由双边政府主导，而受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参与很少。国家领导人非常成功地推销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的整体可行性令人怀疑，但却为他们自己和关键盟友以及选民提供了集中的利益。最初引发“债务陷阱”说法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Ferchen and Perera 2019)。在巴基斯坦等国，高层谈判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关于资源共享的国内争议，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紧张关系，并导致经济精英和弱势群体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出现严重分歧(Markey 2020)。

评估“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行性，拒绝没有说服力的项目申请，本应由融资机构来完成，但这并非总能得到一致的处理。在实践中，只有旗舰机构亚投行才有必要的独立性和能力进行彻底审核并采取行动，而国有政策性银行和丝路基金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能力(Hale, Liu and Urpelainen 2000)。此外，他们直接由中国政府监管（丝路基金则由中国央行监管），承担支持其政治目标的任务，并将在被视作可为中国带来战略或外交利益的项目上遵循其指导(Rudyak 2020)。

最后，在脆弱环境下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主要中国企业发现，他们在复杂环境中的运作经验很少，这在过去很少发生。在理解这种环境以及自身在其中的角色时，他们面临着缺乏冲突敏感性这一能力的重大挑战，并且在接受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方面进展缓慢(Tan-Mullins 2014)。中国坚定地承诺不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事务，这让中国企业甚至不愿在这些地方把自己视为（政治）参与者，结果自然导致他们往往远离当地社区并与之隔绝，很少就自身目标和任务与本地民间社会交流信息，缺乏沟通和处理当地所关切问题的渠道(Jafri 2020)。

尽管已有许多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上述问题也众所周知，但它们如何在冲突环境中具体发挥作用，几乎没有得到系统性的关注。然而，从潜在的环境、发展、融资和社会影响来看，一个共同的线索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受援国的惠益和成本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成员国带来的资源流入可能确实是一件好事，对当地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其不同群体之间惠益的准确分配，可能对该倡议实施的整体影响产生很大作用。在已然经历重大冲突的国家，紧张局势很可能由于对项目及其惠益的不同看法而加剧。

三, 冲突环境下的 “一带一路” 倡议 : 一般性模式

在图1当中，作者利用前述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工具”中获取的数据，以及国家脆弱性指数(State Fragility Index)中的“凝聚力”维度，绘制了“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与冲突倾向的对比图。 绘制的数字是一个国家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所有此类投资的总和，更新到2020年年底[2]。这也可能包括在“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之前已经商定的项目，但由于该倡议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它可以说是最合理的纳入标准。 有关

2 数字仅限于与交通、能源、公用事业和电信四个行业相关的基建投资。

国家凝聚力的数字使用的是最新版本（2020 年）的国家脆弱性指数，因为这些数字往往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大变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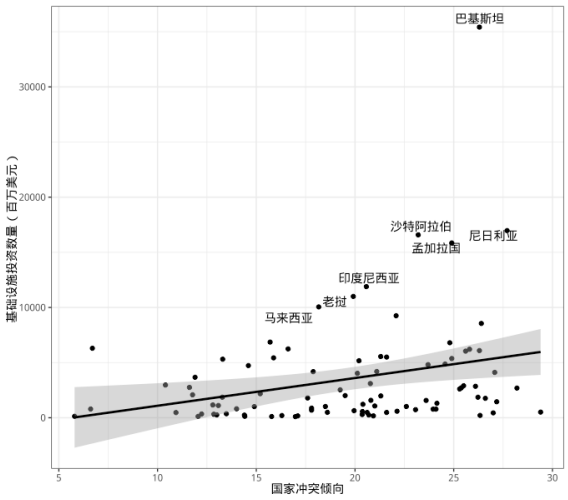


图1：“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与受援国冲突倾向。数据来源：SFI 2020和CGIT（Scissors 2019）。

图1显示了这两个变量的整体相关性， 也标记了吸引大量投资（百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正如这些指标所表明的那样，中国“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显然偏向于冲突风险高的环境。纯粹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摊销期很长，很容易受到战时破坏以及遭遇政治风险，如没收或对现有合同的重大修订。因此，我们期望资本涌入到那些长期稳定的环境中去，但“一带一路”的情况显然恰恰相反。

这其中部分原因是有意为之的，毕竟，“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缓解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强大需求，这些需求至少部分是由于其往往缺乏吸引力的风险状况造成的(Deloitte 2019)。但也有一个因素是路径依赖：“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中国与许多参与国几十年前的接触基础上，通常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中心，以推动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由于中国是一个工业后发国家，这些资源通常必须从西方公司害怕涉足的脆弱国家获得(Alden and Alves 2009)。另一个原因，可以从“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一个旨在增强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地缘政治项目中找到，这导致美国及其许多盟友放弃参与，并鼓动其他国家也不要参与(Ekman et al. 2019)。这一反对将世界上许多最富有和政治上最稳定的国家从潜在的参与国中剔除，从而使“一带一路”合作向更加脆弱的国家倾斜。

3 之所以选择“凝聚力”层面，是因为它反映了直接的冲突风险和持续冲突的措施，而非经济和政治不满，这些不满被视为爆发冲突的风险因素。 图中绘制的数字是其三个子指标(“安全机构”、“精英派系”和“集团对立”)的总和，较高的数字反映了较高程度的冲突倾向。

虽然任何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都会被认为是对资本匮乏国家的一种恩惠，但“一带一路”倡议资本流入的具体形式往往更具争议性。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的案例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这往往与基础设施的政治因素受到低估有关——基础设施与国家发展宏伟愿景的关系、与具体地方政治利益的联系、成本和惠益分配不均，以及尽管项目将对当地居民产生深刻的变革性影响但却缺乏社区接触等。

四，“全天候”朋友与地方上的敌意：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建设

巴基斯坦是最早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也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的所在地。 中巴经济走廊在巴基斯坦的历史，及其与当地冲突环境和政治的许多互动，是漫长而复杂的，实际上，中巴经济走廊的主要特征之一以及它被称作“走廊”的原因，比“一带一路”倡议出现要早十多年。 将俾路支省沿海城市瓜达尔发展为国际港口和贸易枢纽的想法，早在2001年就由当时的总统穆沙拉夫向中国提出了，他力排众议并最终获与中国达成投资和建设协议(Markey 2020)。

尽管有这些早期预警信号，伊斯兰堡最终还是利用习近平主席对推行大胆外交政策举措的渴求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初愿景，向其中国提出了更加宏伟的设计。2013年，由纳瓦兹·谢里夫总理领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新上台政府原则上达成了从瓜达尔到中国边境的经济走廊协议。瓜达尔这个由新加坡港务局断断续续进行管理的港口，将再次由中国经营。它将被设计成为一条直达中国边境的新公路、铁路和电信通道的终点。十几个新的发电厂将解决巴基斯坦长期面临的能源短缺问题。一旦奠定了基础，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新商业园区将启动巴基斯坦的工业化(Small 2020)。除了瓜达尔的几个项目外，中巴经济走廊的融资通过中国的商业贷款来完成，而这些贷款的利率并没有被披露出来。

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加之美国削减其反恐运动力度及其相应援助，谢里夫政府称赞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把它当成一项能让巴基斯坦所有地区分享现代化和全球化红利的国家建设与发展计划来兜售(Ahmed 2018, Hameed 2018)，而非将其视作一项平常的基础设施计划。同样，中巴经济走廊也被广泛宣传为北京和伊斯兰堡之间“全天候友谊”的证明，为的是使人们相信，中国出于战略考虑而大力支持印巴冲突中的巴基斯坦一方(Markey 2020)。这项运动及由此产生的热情反应，也使北京确信巴基斯坦是“ 一带一路”倡议极为友好的国家，值得北京投入大笔资源(Afzal 2020)。

一旦中巴经济走廊从早期愿景过渡到具体项目阶段，现实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在巴基斯坦内部，冲突主要爆发在中巴经济走廊的这三个方面：其项目的分布、体制内的决策职权以及特定协议内容缺乏透明度。所有这些都源于巴基斯坦政治和行政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并未被中方预料到，而这显然震惊了中方(Small 2020)。

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紧张关系是巴基斯坦政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存在与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多种族国家的地位相关，其中最大的群体即旁遮普人在历史上一直统治着政治、国家机构和安全部门(Waseem 2011)。中巴经济走廊相关冲突可以追溯到同样

的断层线，冲突最初便是围绕路线问题发展起来的。在谈判的早期阶段，绘制的项目地图显示一条过境走廊从瓜达尔起步，一路经过俾路支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和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即欠发达的巴基斯坦西部边缘地区）。然而在2014-2015年，由于缺乏现存基础设施和这些地区严重的叛乱问题，中国对这条路线几乎没有兴趣。据称中央政府正在探索一条穿过经济较发达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东线”，引发了“西线”沿线选区的强烈反对(Shah 2015)。于是，一次由所有各方参加的会议在2015年通过了一项折中方案，将单一走廊改为三个南北动脉的走廊以及几处侧连接(Noorani 2016)。然而事实上，大多数承诺的西部道路并未被包含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仍未开始建设甚至是获得必要的资金承诺(Aamir 2019)。不过，这促使相关社区产生广泛的背叛感，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也随之骤降[4]。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另一个优先事项是，通过新建发电厂来改善巴基斯坦长期的能源赤字问题，同样引发了类似的担忧。从2015年到2020年，共有10座发电厂投入运营，增加的发电量总计约5500兆瓦[5]， 然而这些发电站带来的好处并未得到均等地分配。迄今为止完工的发电站全部位于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唯一在地理上位于俾路支省的发电厂事实上建在了卡拉奇的郊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各省之间输电网容量的巨大差异。目前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消费者能够享受中巴经济走廊带来的红利，而西部地区的电网不但十分过时，缺乏联通又布局分散，以致于无法实际将电能输送到当地的每家每户[6]。地方政坛人物和社会运动人士对这种东西不平衡的状态提出过关切，但截至目前，他们的关切未能得到回应，因而未将西部地区的电网升级纳入中巴经济走廊批准的项目清单。

如果用地理位置数据在地图上标出已经完工或开建的项目（见图2），我们会发现很显然提议中的“西线”存在巨大的互联互通设施缺口，而那些发电站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和南部的工业重镇。迄今为止，中巴经济走廊早期阶段的主要受益者是巴基斯坦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同时巴基斯坦的边缘地区则面临被进一步甩在后面的风险。

针对上述担忧，中国及其巴方合作伙伴为了稳定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环境、并重塑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全国性共识，采取了多种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第一种策略关注短期目标，所采取的手段集中在巩固安全措施上；而第二种策略是进行更广泛的政治接触。

4 对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政府一位前顾问和一位俾路支政坛人士的访谈，2020年11月20日、26日。

5 基于巴基斯坦政府中缅经济走廊官方门户网站(http://cpec.gov.pk/energy)发布的能源项目信息。

6 对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政府一位前顾问和一位俾路支政坛人士的访谈，2020年11月20日、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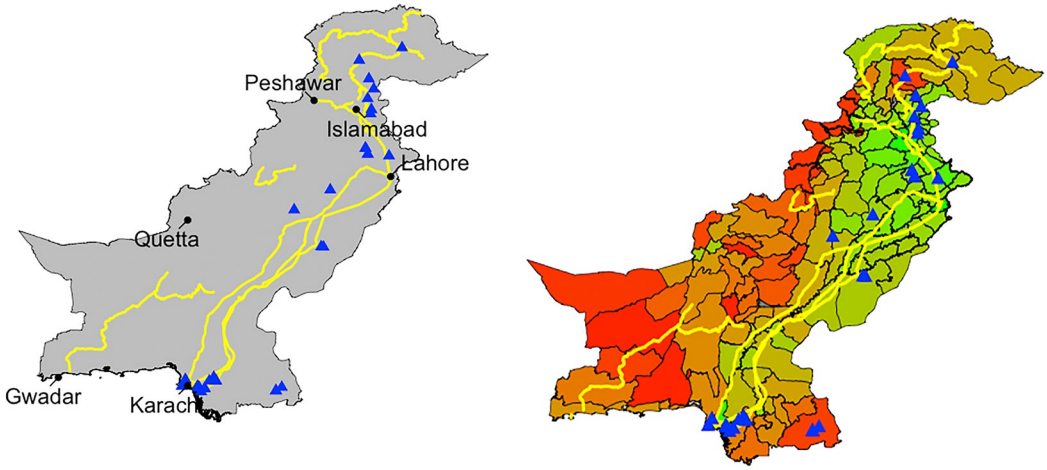


图2:中巴经济走廊向东倾斜部分——巴基斯坦境内互联互通项目（黄色）与发电站项目（蓝色）的地理位置右侧：覆盖地区层面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数据。作者编制项目位置的数据取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重新连接亚洲 (Reconnecting Asia) ”数据库 (CSIS 2019)，仅限于标记为“完成”或“在建”的项目。人类发展指数数据来自Najam and Bari (2017)。

在中巴经济走廊的规划中，安全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占据了突出位置，这主要是为了应对多年来巴基斯坦叛乱分子对中国建筑工人发动的袭击。为确保中巴经济走廊免遭这种威胁，巴基斯坦军方在2016年成立了一支15000人规模的“安全特种部队”，不久之后又投入了一支海军特种支队来保护瓜达尔港(Khan 2016)。这些部队主要部署在西部地区，然而所抽调的人员却来自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部队(Sial 2016)，这很快成为与当地公民和政府的另一个摩擦点[7]。除巴基斯坦政府军之外，几家中国私人安保承包商也在巴基斯坦兜售业务，尽管官方禁止这一行为(Legarda and Nouwens 2018)。

最终，随着巴基斯坦军方越来越多地参与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选择和实施，上述安全化战略也产生了政治影响。这体现出巴基斯坦政治中另一条熟悉的断层线，即军民当局之间存在的斗争(Waseem 2011)。2018年巴基斯坦政府更替是一个重要转折：即将上台的总理伊姆兰·汗之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批评导致了该项目的推迟，并削弱了中国对巴基斯坦民选政府的信心。虽然伊姆兰·汗政府最终接受了这一项目，甚至派出了一名高级将领访问北京以使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重回正轨[8]。但中国却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军方，因为军方被视作唯一内部稳定、能有所作为并完全致力于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巴基斯坦部门[9]。

7 对一位俾路支政坛人士的访谈，2020年11月26日。

8 对俾路支省一位记者的访谈，2020年11月20日。

9 对一位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专家的访谈，2020年10月28日。

尽管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政府仍然坚持由民选政府控制中巴经济走廊，但其继任者显得更有意愿迎合军方的经济和战略雄心[10]。这最终导致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规划在2019年10月“中巴经济走廊管理局”成立后转向集权化。中巴经济走廊管理局由退休将军阿西姆·巴吉瓦领导，遵循了2016年军方提出的模式(Boni and Adeney, 2020)。军方的介入引发了对项目腐败的新担忧——巴吉瓦本人很快卷入了一场个人腐败丑闻，不得不辞去总统顾问的职务，但却继续担任中巴经济走廊管理局的职务(Shahid 2020)。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巴经济走廊管理局的建立仅仅依仗行政命令，最初运行阶段没有得到议会的授权，一直拖到2020年11月才正式成立(Haider 2020)。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积极推动了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管理模式的这次改组，但鉴于与伊姆兰·汗政府初期打交道的经历，中国方面显然乐见改组的发生[11]。

第二种策略是政治性的，这种策略也表明中国官方正在逐步放松其不干涉的官方原则。首先在规划阶段，中国外交官与巴基斯坦反对派进行了接触，反驳了将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视作“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力挺项目”的观点，试图使其免受未来政府更替的影响(Small 2020)。中国谈判代表一定程度上愿意改变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地区分布，例如，同意在所有省份设立相同数量的工业园区(Hussain and Rao 2020)。

第二个政治接触的对象是当地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群体。中国方面邀请俾路支省当地政坛人士和记者访问中国，向他们展示自身现代化的成功，并把中国描绘成巴基斯坦所有人的朋友。然而据一位参与者说，这些尝试效果不佳，因为它们仅仅参照了常规形象工程模板，却并未正视俾路支省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12]。

第三，中国加强了与巴基斯坦政策界的交流，建立讨论会、研究成果共享渠道甚至是全新的智库(Abb 2016)。然而，这些措施面临的问题是，巴基斯坦的政策精英主要来自旁遮普省，原本就对中巴经济走廊持积极态度。来自其他省份的批评人士要么发现自己被完全排除在这些集会之外，要么不相信自己的意见能够被认真对待[13]。此外，中国的一些政治传统也可能削弱了此类渠道的有效性。比如，中国倾向于对国内政策圈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要求其进行照本宣科式的讨论，这也削弱了此类渠道的有效性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组织了一场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信息宣传活动，宣扬该项目的发展和战略利益，这些宣传倾向于把巴基斯坦国内对该项目的批评与外部敌人相关联，从而削弱批评之声的合法性(Afzal 2020)。

这一政治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汗政府全力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可以说建立了自中巴经济走廊成立以来最广泛的国内精英共识。中国继续在巴基斯坦公民中享有高度积极的形象和充分的信任(Pew Research 2015)，而根据中方的一项调查，中国企业

10 对一位研究军民关系的巴基斯坦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6日。

11 对一位研究军民关系的巴基斯坦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6日。

12 对俾路支省一位记者的访谈，2020年11月20日。

13 对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政府一位前顾问和一位俾路支省政府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22日、12月2日。

的活动得到了63%的认可度，这一比率远高于44%这个在多个“一带一路”样本国家得出的平均值(Sina Finance 2020)。至关重要的是，除了俾路支省的一些分裂组织外，批评中巴经济走廊的人并不反对整个项目，实际上他们往往希望分得更大的一块。未能实现更公平的分配主要归咎于伊斯兰堡当局和巴基斯坦自身政治制度的缺陷[14]。

然而，对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来说，中巴经济走廊的好处被剥夺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反对就越有可能变得更加彻底。在俾路支省，关于中国是一个新殖民主义、剥削性的大国行为者的说法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赞同，并被用作招募叛乱组织的工具。最抢手的互联互通和电力项目已经不可避免地分配给旁遮普省和信德省，而巴基斯坦的周边地区将在比赛中出局，这种结构上的劣势将继续阻碍有关工业园区的后续计划，进一步加剧地方发展的差异(Hussain and Rao 2020, Small 2020)。于是，由于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对中央政府的怨愤进一步加剧，通过中巴经济走廊来实现的国家建设雄心迄今为止已经失败了。

草根层面的接触也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结果：项目附近的许多当地居民认为中国公司冷漠、忽视或漠不关心他们关切的问题(Jafri 2020)。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努力是不存在的，在努力尝试过的地方——比如为瓜达尔儿童提供教育的一个项目——被认为远远不够[15]。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中国公司在当地的公关活动大多是无效的。

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策略同样产生了好坏参半的效果。总的来说，巴基斯坦的叛乱和暴力在过去几年中显著减少，包括与中巴经济走廊相关的地区。然而，俾路支分裂份子和伊斯兰极端份子的中坚力量继续把中资项目作为攻击目标[16]。就在最近两年，俾路支解放军袭击了瓜达尔的一家酒店、卡拉奇的中国领事馆以及中国建造的证券交易所，每一起袭击都造成多人死亡。这一行动阻碍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并极大限制了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的活动(Aamir 2018)。

那些为保护中巴经济走廊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进一步疏远了当地社区，特别是在瓜达尔这样的戒备森严的区域，那里一层层的检查站限制了当地人的行动，常被视为是一种骚扰[17]。这样的严苛戒备还大大限制了当地渔民出海，不仅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反而造成他们的生计受损[18]。所有这些现状都造成了一种与当地社区脱节的感觉，并助长了一种说法，即中巴经济走廊是一个由寻求剥削俾路支省人民的外来者设计的新殖民主义项目。

除了社会成本外，严格的安全制度也增加了巴基斯坦的财政负担，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电力税却不得不由消费者来承担(Kiani 2017)。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安全体制进一

14 对一位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专家、一位巴基斯坦智库专家以及一位俾路支省政府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5、10月30日、12月2日。

15 对一位俾路支省政府顾问的访谈，2020年12月2日。

16 对一位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5日。

17 对俾路支省一位记者的访谈，2020年11月20日。

18 对一位俾路支政坛人士和一位俾路支省政府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26日、12月2日。

步加强了军方在巴基斯坦政治中的地位，进而造成了其他一些问题——比较明显的是缺乏民主合法性和公众问责，对于宪法授权的权力下放也是一种打击(Boni and Adeney 2020)。由于军队被视为主要由旁遮普省的精英主导，巴基斯坦中央和边远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进一步加剧。

中巴经济走廊在巴基斯坦的建设历史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和中国利益之间的复杂互动，后者往往面临要在经济可行性、战略设计、满足当地政治精英预期及管理安全关切之间进行艰难选择。部分当地精英——主要是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政府、结盟的商业精英以及后来的军方——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非常成功地带来了各自的影响。然而其他一些人，尤其是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则要糟糕得多，中巴经济走廊加剧了这些团体之间的冲突(Hameed 2018)。这种本地化利益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利用甚至绑架，不仅体现在项目选择上，也体现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期望塑造及围绕其进行的更大规模叙事上。这里，规划阶段进行的炒作产生了以利润为导向的中国投资不可能达到的预期。

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总体上很友好，但巴基斯坦艰难的政治局势和现有的冲突最终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重大挑战，而中国的行为体显然低估了这一点。进入巴基斯坦的中国企业缺乏冲突管理能力，甚至缺乏对当地情况详细信息的掌握，同时官方指南要求它们避免任何可能被视为政治干预的行为(MOFCOM 2019)。在上述所有层面积极开展对外接触，将有助于中国避免卷入冲突，改善预期管理，并可能节省现有安全措施下的高昂成本。

五, 在复杂局面中寻求合作 : 缅甸的 “一带一路” 建设

2021年2月1日，随着缅甸国防军的夺权，缅甸从军事统治向民主的过渡戛然而止。尽管中国官方否认事先了解缅甸军方的意图，但此次夺权行动还是把中国推到了一场具有紧张国际影响的重大国内政治危机的舞台中央(Myanmar Times 2021)。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军方的夺权实际上结束了2010年代以来重新引入多党选举后缅甸开始的政治转型和逐步自由化进程。2021年2月，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和其他政党代表被逮捕和拘留，在缅甸国内引发了广泛的“非暴力反抗”运动(BBC 2021)。

除军事夺取政权后的政治动荡之外，大量的地方冲突仍然主导着缅甸的政治格局，这些地区通常由缅甸国防军、准军事组织或民族武装组织控制，以及那些“混合权力”地区。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是缅甸最突出的国际投资者，同时也是该国的国防和外交盟友。然而在2010年代早期，两国关系出现了短暂恶化，包括密松水电站在内的几个中资项目被缅甸叫停(Gong 2020)。2017年，随着昂山素季政府被指控对若开邦的对罗兴亚人实施暴力，西方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缅甸对若开邦局势的处理，并开始撤回项目资金和投资。因此，缅甸不得不继续对中国保持经济上的依赖，内比都开始重拾“向东看”的经济政策(Lwin 2019)。

在昂山素季的领导下，缅甸与中国于2018年签署了加入“一带一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北京试图通过该途径加强两国的双边经济关系(Liu 2020)。在2020年1月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习近平主席谈到了两国之间的“胞波”友情，试图用这个意为“兄弟般”的缅甸语词汇唤起两国的文化合作和历史纽带所蕴含的象征意义。2021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缅甸期间，敦促加快实施“一带一路”项目并取得进展，特别是皎漂深水港和曼德勒—皎漂铁路的建设。

几十年来，中国在缅甸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仍然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重点领域包括水电、石油和天然气以及采矿(Lwin 2019)。“一带一路”项目被作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缅经济走廊的组成部分，该走廊由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组成，旨在支持缅甸、中国和周边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

官方的中缅经济走廊项目包括从中国云南省通过木姐和曼德勒到皎漂的公路和铁路运输线，那里有一个规划的深海港口，是皎漂经济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皎漂位于若开邦，那里是针对罗兴亚人暴力活动的中心，该地区的局势依然高度紧张。另一个规划中的经济特区是密支那经济开发区，建成后将占据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周围约2000公顷土地(Sandhi Governance Institute 2019)。该地区是克钦独立组织的地盘，这一组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追求联邦制，是缅甸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Irrawaddy 2019)。克钦独立组织的武装力量——克钦独立军经常与缅甸国防军发生冲突(Swe Lei Mon 2020)。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北部木姐，第三个经济特区正在开发，其周边地区受到来自缅甸国防军、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民兵以及其他政府和武装团体代理人等许多当地冲突的影响(Asia Foundation 2017)。

大多数被正式贴上“一带一路”倡议标签的项目都规划在没有激烈冲突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边缘群体是脆弱的，人们心中的怨愤正在滋长，他们还担心缅甸军方强人和缅甸经济精英可能会从中国的投资中获益最多，而普通民众却无法从中受益(Lo 2019)。

缅甸各地持续不断的次国家层面冲突很难被忽视，在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人们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行性提出过质疑(Lwin 2019)。暴力已经与中缅经济走廊的安全化联系在一起。例如，2020年10月，缅甸国防军开展了一次军事行动，旨在为曼德勒-腊戍公路沿线的中缅经济走廊有关项目“提供安全保障”。不过当地人权分析家认为，这次行动包括在南部的皎美镇进行狂轰滥炸、酷刑、抢劫和破坏财产(Shan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2020)。

虽然中国官员担心中国工人的安全受到潜在威胁，但如何保障受冲突影响社区的安全却被官方话语忽略。中国政府官员在发言中经常声称，“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经济发展一定会促进当地和平。然而，缅甸冲突的根源不仅仅是“欠发达”，多层面的次国家冲突动态因背景和群体（种族、宗教、性别和代际）不同而有所差异，这意味着不存在一项“包治百病”的万能政策(Asia Foundation 2017)。

尽管中国的官方政策是不干涉他国内政，但它并不排斥在这一复杂的国情下扩大政治介入。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使中国能够将缅甸的一些少数民族组织——尤其是克钦独立军、佤邦联合军和果敢军带到谈判桌上(Sun 2017)。

在2010年代，由于债务、环境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缅甸政府对中国投资普遍采取谨慎态度。例如，2011年密松大坝的叫停，就是因为该项目不仅受到可能受影响社区的反对，也被居住在缅甸中部的精英阶层所抵制(Sze Wan Chan 2017)。人们担忧的焦点是大坝可能对伊洛瓦底江流域的下游社区产生包括洪水在内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包括洪水、大量土地被征用和民众的流离失所(BBC 2019)。尽管有这些担忧，中国投资者仍在游说，希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重启这个不受欢迎的项目(Lo 2019)。

此前的研究表明，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对2400万缅甸人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河流相关基础设施的开发、森林砍伐和土地使用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泥沙沉积、水污染和人们生计的破坏(Helsingen et al. 2017)。在昂山素季的领导下，缅甸政府努力实施更强有力的投资监管框架。根据2018年公布的《缅甸可持续发展计划》，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需要通过符合国际标准的可持续商业流程和程序标准。然而，非政府组织分析人士质疑出自集中决策的规划模式，如《缅甸可持续发展计划》，能否有效应对“一带一路”这种排除了与当地社区接触的投资模式所带来的诸多挑战(Zhou 2019)。为确保长期规划的“一带一路”项目取得进展，北京不断向缅方施加压力并要求其作出让步，这已经使缅甸的政治机构产生了被威胁感。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会“激起公众的愤怒”，引发针对项目的抗议和武力活动，而这类项目往往对冲突缺乏敏感性(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20)。

尽管中国在缅甸投资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长期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府内部、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但最近的访谈帮助我们从当地民间社会的角度了解到更多“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的机遇和关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人们期望其项目可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渠道，当地经济也将从新冠疫情带来的损失中恢复过来，GDP也将增长[19]。皎漂附近的居民期望“一带一路”相关的新公路和小额信贷项目能够帮助他们改善当地的生计[20]。许多缅甸的中小企业，包括贸易商，也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缅贸易持乐观态度(Mark et al. 2020)。然而，尽管“一带一路”为缅甸当地社区和企业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但一些与冲突相关的重要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

一位当地的专家指出，掸邦北部的武装冲突在过去五年间逐渐扩大，殃及更多城镇，所有这些城镇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一带一路”项目有关[21]。所有的受访者都预测道，如果“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经过受冲突影响的地区，那么进一步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形成上述预测的一个因素是“一带一路”投资需要更多的安全保障，这将导致军事

19 对一位研究私营部门投资的缅甸当地咨询师的访谈，2020年12月4日。

20 对缅甸仰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21 对掸邦一位研究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6日。

化程度的提高[22]。人们担心，民族武装组织或国家支持的民兵组织可能会因参与某些 “一带一路”项目而发生转变，在财政上增强他们的实力，并导致更多武装团体发生演变并相互竞争、对抗和进行更多不必要的冲突[23]。

中缅经济走廊被视为中国对该地区的愿景，而不是为回应缅甸人民的具体关切和优先事项而制定的政策(McCarthy 2020)。项目计划通常被认为是由中国公司制定的，这些公司不主动制定预防或解决冲突根源的举措，对复杂的环境缺乏充分的了解[24]。由于缺乏可获得的透明信息，人们普遍对“一带一路”项目定义以及中国在缅甸投资的广义范畴类别缺乏了解[25]。这导致了理解上混淆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并助长了社区对项目决策缺乏包容的愤怒[26]。人们普遍认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惠益将不可避免地难以得到均衡分配，而精英阶层和国防军成员将是主要受益者[27]。

在克钦邦，人们认为中国工人比当地工人更可能获得工作机会[28]。一位受访者表示，由于中国公司更有可能中标，越来越多的本土公司寻求与中国公司合并以获得更多工作机会，人们担心这可能会延续雇佣中国工人的趋势[29]。在若开邦，巴马族裔的工人被认为比其他族裔社区的工人得到更高的工资，加剧了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30]。缅甸的“一带一路”项目被认为为女性提供了较少的工作机会。鉴于建筑工作的体力劳动性质，大多数工作岗位被男性占据[31]。从各个层面看，女性在“一带一路”项目规划中的参与程度不高，从而导致人们批评“一带一路”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对性别议题不敏感[32]。

尽管各方正努力通过创建在线平台“项目库” (Clapp 2020)来提高项目招标的透明度，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明确信息仍然匮乏，这就使当地社区经常处在信息滞后的状态。于是，受影响居民的焦虑感不断加剧，他们担心自己的农田被侵占而要被迫离开家园或放弃生计。2012年出台的《空置、休耕和未开垦土地管理法》使上述情况变得更加可能，这部法律几乎无法为居民（尤其是妇女）提供避免土地侵占的保护[33]。对于那些获得土地补偿费的人来说，补偿费的价格通常被认为低于土地的价值。此外，已经出现了一些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土地征用案例，它们大多与三个计划创建的经济

22 对一位研究私营部门投资的缅甸当地咨询师的访谈，2020年12月4日。
23 对若开邦一位民间社会组织领袖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24 对缅甸北部一位民间社会组织代表的访谈，2020年11月23日。
25 对掸邦一位研究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6日。
26 对掸邦一位研究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6日。
27 对若开邦一位民间社会领袖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28 对若开邦一位民间社会领袖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29 对若开邦一位民间社会领袖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30 对缅甸仰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31 对缅甸北部一位民间社会代表的访谈，2020年11月23日。
32 对缅甸北部一位民间社会代表的访谈，2020年11月23日。
33 对缅甸仰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特区有关[34]。民间社会代表预测，由于人们认为政府没有提供补偿的财政资源，未来将会出现更多与土地有关的怨怼，从而加剧人们对更多土地可能被没收的担忧[35]。

尽管缅甸政府偶尔会采取行动，确保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被纳入中国投资协议，但这些评估并不总是独立进行的。过去，缅甸政府常常忽视将民间社会纳入协商进程，导致未能避免有害的环境和社会影响[36]。据缅甸北部的一个人权组织称，中国投资者与部分可能受到具体“一带一路”项目影响的当地社区据报进行过磋商，但结果好坏参半[37]。例如，当中国企业为建设密支那附近的经济特区与当地社区进行接触时，中国投资者据称向受影响村民提供了很少有关项目的信息，从而使谈判变得困难和不甚清晰[38]。这样的经历在当地社区关系中引发了怀疑，认为协商是故意不透明的，因为公司担心人们消息越灵通，就越有可能反对或抗议[39]。

尽管军方夺取政权的长期影响仍不得而知，但“一带一路”倡议要想在缅甸取得成功，所有攸关的行为体必须更好地理解与当前地方冲突相关的诸多因素。如果中国与缅甸军方联系更紧密，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人们对“一带一路”的信心。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就能导致和解的主张过于简单化，必须考虑具体社区特别是妇女和其他边缘化和少数群体的关切和优先事项，以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具备真正的冲突敏感性，从而使项目不仅不造成损害，而且有助于产生和平红利。受影响的社区目前没有获得“一带一路”项目的事先知情同意权，此前的磋商尝试也被视为徒有其表或效果甚微。如果中国投资者的政策和做法不发生改变，缅甸对中国投资的犹豫可能会继续下去。虽然中国是否愿意更多地参与陷入僵局的缅甸和平进程仍有待观察，“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核心的机会。如果中国能抓住这个机会，将有可能对缅甸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六, 多疑的邻居 : 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投资的看法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连接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国家拥有发达的民间社会，经常被称为威权地区的“民主岛”。自1991年独立以来，它始终见证着政治动荡和国内种族冲突的场景。2010年，该国南部多民族分布的地区发生暴乱，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冲突导致数人死亡，以及更多人受伤和流离失所(Pannier 2020)。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国界交错的费尔干纳山谷，当地社区和安全部队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跨境冲突也已司空见惯了，这主要是由于领土争议或为了争夺维持生计所需的稀缺土地和水资源的使用权，而国家和种族身份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政府当局的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同样也会加剧紧张和不信任。

---

34 对缅甸北部一位民间社会代表的访谈，2020年11月23日。

35 对缅甸仰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以及对一位研究私营部门投资的缅甸当地咨询师的访谈，2020年12月4日。

36 对若开邦一位民间社会领袖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37 对若开邦一位民间社会领袖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38 对缅甸北部一位民间社会代表的访谈，2020年11月23日。

39 对若开邦一位民间社会领袖的访谈，2020年11月19日。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国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俄罗斯的角色。自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在中亚的投资稳步增长。虽然这些投资中没有一项可以和“一带一路”“正式”挂钩，但其实很多都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号(Mogilevskii 2019)。2019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近一半的债务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持有(BBC 2019)。

尽管政府间的贷款近来有所下降，但来自私营和中国国有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仍在大量地涌入采矿和石油领域，且通常以与吉国当地资本合作的方式进行(Dirk van der Kley 2020)。截至2020年，该国金属行业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总量的79%，是第二大行业——建筑和建筑材料的十倍多，后者仅获得7.1%的外商直接投资(OECD 2020)。此前，中国政府曾以优惠贷款的形式为一些交通和能源互联互通项目提供过融资，但这些贷款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数额较小的赠款所取代。

中国的投资为当地社区带来了就业机会（尽管本地工人和中国工人的数量比例仍然是争论的焦点，薪酬差异也是如此）。 这些投资还可以带来培训和技能培养计划以及中文课程[40]。 更好的道路和交通联系有助于货物运输并促进新商业发展[41]，包括当地人新开的商店。 尽管男性往往被雇用从事采矿或精炼的重体力工作，但女性也可以找到工作机会（通常比正常人收入更高）成为厨师或清洁工，有时还能在社区和公司之间充当联络人[42]。虽然吉国经历了数次政权更迭，但大多数议员和高级官员们仍然支持中国的投资。他们认为中国的投资是政府收入、基础设施发展甚至个人财富的重要来源。 由于不附加任何条件以及遵守当地规则，中国的资金和投资也很受欢迎[43]。 实际上，许多项目是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或当地企业的倡议下启动的，然后又从中国寻求资金[44]。但是鉴于许多官员不受欢迎以及对政府当局的不信任，国家或地方官员的认可几乎无法转化为更大的公众支持。

尽管中国的经济作用变得日益重要，但吉国公众仍普遍不信任中国。民意调查显示，由于历史、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纽带，俄罗斯依然能得到吉国民众更大的支持(Laruelle and Royce 2020)。 据报道，2018至2020年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42起与中国有关的集会和抗议活动(Central Asia Protest Tracker 2020)。

几个由中国政府贷款融资或中国私营企业投资的项目已经在当地声名狼藉了。在一个耗资3.86亿美元的比什凯克热电厂现代化改造项目完成后，2018年冬天该热电厂的一次故障导致首都居民没有得到供暖，从而引发了腐败指控，最终一名前总理和其他官员被判处长期徒刑(Fergana News Agency 2019)。 最近，在2020年10月的政治动荡之后，当地居民控制了一些采矿设施，有些地方甚至驱逐了经理和中国工人(Shaku 2020)。

40 对一位聚焦中国在中亚活动的研究者和记者的访谈，2020年11月10日。

41 对吉尔吉斯斯坦一位和平与安全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17日。

42 对一位研究中亚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3日。

43 对一位研究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活动的学术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2日。

44 对一位聚焦中国在中亚活动的研究者和记者的访谈，2020年11月10日。

当地部分社区认为，中国正企图掠夺吉国土地，历史上有关土地的争端以及对“债务陷阱”的担忧强化了以上看法。投资被视为中国在海外落脚以提升自身影响力并换取外国支持其某些政策（比如涉疆政策）的一种尝试[45]。人们主张，中国的“扩张者”角色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在面对这个强大邻国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力量时只有有限的自主权。

许多人相信，投资旨在惠及中国自身和吉国精英而非当地社区，特别是对发言权较小、获取福利较少的妇女和边缘群体来说，中国投资带来的好处有限。同样的工作中国工人的薪水更高，或者钱都进入了腐败官员的口袋，这些都被用作上述观点的例证[46]。“一带一路”项目交通线路避开了主要城镇和聚居区，给当地社区带来的惠益很少[47]。例如，吉尔吉斯南部将在讨论已久的中吉乌铁路中发挥关键的过境枢纽作用，但铁路沿线的社区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Roberts 2019)。当地社区和中国工人之间有限的互动导致针对中国人的排华态度有所加深。抗议者要求要么驱逐非法的中国移民，要么终止中吉两国人民通婚(Imanaliyeva 2020)。

人们对中国和中国投资的认知可能大相径庭，此类差异取决于就业、社会地位、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确定人们对中国投资影响的感知。同时，由于具体项目的实施阶段不同，人们的看法也会出现差异。例如，在那些项目已经推进到深入阶段的地方，当地社区据称会更了解项目的预期成果。相反，如果项目仍在规划或探索阶段，事情就会更不确定，人们看待项目时也会带着疑虑。媒体报道同样发挥着作用[48]。在俄语新闻更为普及的俄语社区中，人们的观点不同于那些用当地语言在社交媒体上非正式分享信息的社区。谣言或者可疑的媒体报道会助长已有的愤懑情绪和看法。例如，新冠疫情使得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有所增加，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进而强化了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的反对[49]。不过，疫情期间中国对中亚的支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反对情绪[50]。

中国投资对生计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差异。一些项目提供工作和培训，大量当地劳动力从中受益。然而，这将引起未被雇佣的社区成员的怨恨。比如，在贾拉拉巴德省的阿拉布卡村，我们听说了城镇中心的人是如何从富金矿业公司矿藏相关工作中获益的，但是城外的人们感到自己被忽视了，从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华情绪。许多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人拿自己的报酬和福利与那些因特殊技能或项目管理经验而被引进的中国劳动者相比较。在一些矿区，由于中国公司增加的采矿作业活动，在地表挖掘黄金或其他矿产的手工采矿者和小规模作业的矿工现已经被挤出了这个行业。

45 对吉尔吉斯斯坦一位和平与安全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17日。

46 对一位研究中国在中亚活动的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2日。

47 对一位研究中亚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3日。

48 对吉尔吉斯斯坦一位和平与安全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17日。

49 对一位研究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活动的学术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2日。

50 对一位研究中国在中亚活动的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2日。

中国项目带来的环境影响已成为反华抗议的一个重要缘由。部分当地居民，尤其是农牧民，宣称深受污染之害。他们认为自己的土地已经被矿山和精炼厂污染了。虽然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评估几乎从未在项目的任何阶段实施过[51]，但部分受访者提到了一些公司，比如恰特卡尔区的Kichi Charaat，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同当地工人发展出一条更好的合作路径，倾听他们的需求并据此为他们量身定制社会保障计划[52]。在Salton-Sary等一些此前曾发生过当地社区与中国工人之间暴力冲突的金矿(Kabar 2019)，河流污染和畜牧损失的案例在附近的定居点被频繁地提到，虽然这些案例并未提供充分的确凿证据。在比什凯克，那家2018年发生严重故障的热电厂，因其基于燃煤使用而被视为导致城市严重污染的“非绿色”项目[53]。在吉尔吉斯斯坦，尽管国家反复开展检查行动，但几乎没有公众信任这些检查[54]。在部分案例中，中国公司已缴付了罚款，但这对消除当地民众担忧或解决其不满收效甚微。

腐败或者说人们对它的看法，是使当地官员乃至中国投资者声名狼狈的一个因素。中国资助的比什凯克热电厂改造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其中政客被指控涉及贪腐，然而访谈显示，这并不是唯一的个案。中国企业与当地决策者之间达成的许多交易都并不透明，不接受公众监督，容易招致腐败交易使精英受益的指控。由于中国企业偏向于只与当地官员打交道，并不直接与民间社会接触，上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当中国公司与当地社区发生争议时，他们被认为首先与当地官员接触寻求应对，然后进一步上升到各州首府或比什凯克更高级别官员处获取协助，而不是同那些受影响的社区民众合作[55]。这强化了公众的认知，即这些项目旨在使特定人群受益，而不是惠及民众。

中国公司和工人的与世隔绝和安全化也激化了这种紧张局面。中国工人有自己的园区，与项目所在地的社区民众分开居住，由中国私人保安公司提供安保(Niva and Dirk 2020)。安保公司被雇佣以保护中国工人，以防“有敌意的人群”发起攻击。这只会进一步隔断中国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使当地民众愈发强烈地感到军事化、不安全甚至产生自己土地被人“占领”的感受[56]。有时，中国工人的行为举止被认为显得比当地人“高出一等”，他们雇用自己的司机、翻译、厨师和清洁工。这被认为是对当地居民的不尊重，这些当地人希望可以共同分享受人尊敬的高收入岗位[57]。

普遍存在的信任赤字也影响了民间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人们怀疑为什么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国际机构想要介入“内部”或国家事务，除非它们代表了外国势力的利益[58]。因此，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和中国公司都希望将第三方排除在外，这意味着没人能够

51 对一位研究中国在中亚活动的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2日。

52 对吉尔吉斯斯坦一位和平与安全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17日。

53 对一位研究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活动的学术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2日。

54 对一位聚焦中国在中亚活动的研究者和记者的访谈，2020年11月10日。

55 对一位研究中亚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3日。

56 对吉尔吉斯斯坦一位和平与安全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17日，以及对一位研究中国在中亚活动的专家的访谈，2020年11月12日。

57 对一位聚焦中国在中亚活动的研究者和记者的访谈，2020年11月10日。

58 对吉尔吉斯斯坦一位和平与安全顾问的访谈，2020年11月17日。

从民间社会组织在具体问题上提供的专业知识中受益，这些问题包括如何进行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投资，以及如何确保当地人满意并积极参与[59]。

中国投资者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争取公众对中国投资的支持方面面临着一场艰苦的爬坡之斗。考虑到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的强烈反对，许多投资者可能决定放弃在吉国投资并转而将关注点转移到其他中亚国家，或者将焦点移至软实力上，比如为应对新冠危机提供支持。然而，对于任何持续的投资，双方都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的方式，尤其是仔细考量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包括对妇女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不同影响，并考虑在项目各阶段采取更加透明、包容和响应的方式与公众合作。

七, 东非地带：陆锁国乌干达的“一带一路”投资

自1962年摆脱英国殖民独立以来，乌干达的政治和社会一直以南北分歧和引发冲突的紧张局势著称。从历史上看，问题的根源可以从殖民遗产以及种族和宗教分裂中找到(Lwanga-Lunyiigo 1987)。1986年以来，乌干达政府在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领导下，塑造了乌干达的政治格局，为乌干达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和经济繁荣(BBC 2018)。然而，按族裔和地域进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排斥继续产生不稳定影响，并成为政治冲突的催化剂(Saferworld 2020)。

1987年，乌干达和中国签署一项主要双边经济合作协议后(Obwona et al. 2007)，中国公司开始投资基础设施——主要是建造房屋、道路和桥梁。自那以后，中国的投资额显著增加。2006年，主要得益于在乌干达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发现了石油矿藏，中国的投资进一步加速流入乌干达。然而，自然资源治理不善导致土地和自然资源纠纷迅速增加，特别是在该国北部，上述情况尤为显著。土地所有权是造成紧张和暴力的主要根源，其在历史上一直改变边界和区域界限以适应政治利益，常常导致流离失所或剥夺人们的权利(Saferworld 2021)。

乌干达人口年轻且增长迅速。2019年，该国46.5%的人不满14岁(Statista 2020)。虽然政府政策刺激了该国的经济增长，但其对创造就业的影响很小。分析表明，每年达到工作年龄的70万年轻人中，只有十分之一有足够的正规就业机会(Economist 2021)。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加上生活成本的上升，成为年轻人和被剥夺权利者不满的主要来源，尽管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CIVICUS 2018)，这些人已经开始用更强力的方式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2018年，乌干达签署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据估计，“一带一路”倡议在乌干达投资的合同总金额约为18亿美元(Scissors 2019)。“一带一路”的主要项目包括：中国交建对恩德培机场4.8亿美元的扩建，中国交建也参与了修建机场和坎帕拉之间的收费公路；卡鲁马和伊辛巴的两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均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支持；以及若干铁路和公路建设项目(Wingo 2019)。

59 对一位研究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活动的学术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2日。

在乌干达，大多数由中国支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都来自政府间的双边发展支持——主要项目是由中央提议和批准的[60]。与西方投资来源相比，乌干达政府更加倾向于将中国投资作为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来源，因为中国声称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Kynge 2014)。因此，中国的融资一直被视为填补该国基础设施缺口而又不招致对乌干达政府更不自由政策的批评的重要途径。

从最近对乌干达民间社会代表的采访来看，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有潜力为乌干达人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它们改善了互联互通和当地的基础设施，并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61]。一位当地的土地利用顾问表示，中国投资为当地投资者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例如在木材生产、生态旅游和卫生领域[62]。更大规模的项目，如中国—乌干达农业工业区，由科宏集团投资，估值2.2亿美元(Oluka 2016)，预计将提高当地农业产量并增加乌干达包括皮革、油和种子在内的出口价值(Xinhua 2020)[63]。

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对当地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据报道，伊西姆巴和卡鲁玛水坝的建设增加了尼罗河沿岸的侵蚀和洪水泛滥[64]。虽然环境破坏威胁到生计，但受不利影响的往往是妇女，因为她们是受不利影响的农业工作的主力军。这导致许多妇女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她们不得不回到家中，因此陷入了更深的贫困之中[65]。另一方面，男人被认为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短期就业机会，尤其是对体力有更高要求的工作，例如修建公路和水力发电站，从而更有能力寻找其他谋生途径[66]。

土地对乌干达人而言是一项重要但敏感的资源，被认为对文化认同和维持生计至关重要(Saferworld 2021)。然而，“一带一路”项目交付所需的土地只是通过官方收购程序获得，由此导致许多侵权事件的发生，其中包括毫无赔偿的强行驱逐[67]。一位当地专家表示，土地收购可能加剧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地方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边缘化人群，尤其是乌干达北部的边缘化群体，在投资者和政府面前捍卫自己的土地和利益的意愿越来越强[68]。

中国投资抬高了推动基建建设、矿业勘探与发掘以及城市化和农业商业化所需土地的需求(Xinhua 2018)，需求上升又使得“一带一路”工程点沿线土地价格迅速增长，如Mbale工业园（又称“五英里”），就“使得许多乌干达投资者望而却步”[69]。同时，在“一带一路”项目沿线，租金也显著增长，这迫使部分当地居民离开家园以寻找更廉价的租

60 对一位乌干达研究人员和讲师的访谈，2020年11月22日。

61 对一位乌干达研究人员和讲师的访谈，2020年11月22日。

62 对一位乌干达环境与土地使用咨询师的访谈，2020年12月7日。

63 对一位乌干达人权、正义和问责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4日。

64 对一位乌干达人权、正义和问责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4日。

65 对一位乌干达冲突解决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1日。

66 对一位乌干达研究人员和讲师的访谈，2020年11月22日。

67 对一位乌干达环境与土地使用咨询师的访谈，2020年12月7日。

68 对一位乌干达冲突解决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1日。

69 对一位乌干达研究人员和讲师的访谈，2020年11月22日。

住地[70]。一旦在获取土地问题上发生争议，当地的业主可以寻求经济补偿，但这一方式存在限制。一位居住在坎帕拉的研究者称，由于乌干达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尤其是年长女性本就有限的议价权可能会被占便宜，最终导致她们被骗而失去所有的补偿[71]。尽管对于受土地问题困扰的人而言，法律诉讼通常是唯一可行方案，但许多提起诉讼的人面临着司法程序迟滞的问题。例如，一个早在2014年就提出的司法诉讼至今仍在审理[72]。因此，走法律途径的通常只有那些能负担费用的上层社会人士，而这反过来也会让上层社会得利。

尽管“一带一路”投资为乌干达政府的发展计划提供了助力，但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意识的问题使得民众愈发不信任政府[73]。有指控称中国公司为获取重建连接坎帕拉至津加的高速公路合同进行了秘密游说(Daily Monitor 2019)，随后腐败指控直接指向了政府授予中国企业合同的行为，人们纷纷呼吁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和责任意识[74]。人们尤其是当地商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合同竞标过程中存在腐败。在“一带一路”项目竞标中落选的乌干达企业将此归咎于当地官员偏袒通常打着“一带一路”旗号的中国企业。这样的认知加深了人们对乌干达国家公路局或首都坎帕拉市政府等当局相关部门贪腐的怀疑[75]。

2019年，中国投资为乌干达创造了约1.8万个工作岗位(Mayers and Barungi 2019)。由于该国失业率高，尤其是在18至30岁的人口中尤为严重。因此，工作岗位的增加受到了当地社区，尤其是那些居住于“一带一路”项目点附近民众的欢迎[76]。尽管许多负责执行“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企业雇佣的员工绝大多数为乌干达临时员工，比例大多超过95%(Mayers and Barungi 2019)，但他们工作环境糟糕，缺乏就业保护以及认为受到了不公平的薪资待遇，这为就业率提升这一积极变化带来了负面影响[77]。有报告显示，在卡鲁玛大坝建设过程中，有许多当地劳工因缺乏个人防护装备而受伤[78]。此外还有报告指出，一些中国投资者不懂乌干达的劳动法(Musoke 2020)，他们常常忽视乌干达劳工权益组织[79]。受此影响，2020年乌干达劳工联盟出台了项目，旨在帮助中国企业家更加负责任地在乌干达开展经营活动(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2020)。然而，当地人依然认为中国企业更重视项目效率而非社会及企业责任[80]。

---

70 对一位乌干达研究人员和讲师的访谈，2020年11月22日。

71 对一位乌干达研究人员和讲师的访谈，2020年11月22日。

72 对一位乌干达环境与土地使用咨询师的访谈，2020年12月7日。

73 对一位乌干达冲突解决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1日。

74 对一位乌干达人权、正义和问责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4日。

75 对一位乌干达人权、正义和问责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4日。

76 对一位乌干达研究人员和讲师的访谈，2020年11月22日。

77 对一位乌干达环境与土地使用咨询师的访谈，2020年12月7日。

78 对一位乌干达冲突解决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1日。

79 对一位乌干达冲突解决专家的访谈，2020年12月1日。

80 对一位乌干达环境与土地使用咨询师的访谈，2020年12月7日。

近年来，居住于乌干达的中国公民数量显著增长。当地人对大量中国人出现在乌干达的态度开始转变，加之受新冠疫情影响，乌干达反华民意呈上升趋势。尽管中国的努力被视作为乌干达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贡献，但在2020年，乌干达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仇外情绪和歧视仍然有所上升(Oryem 2020)。

尽管公众不满不断上升，但“一带一路”倡议仍受到乌干达中央政府的欢迎。尽管“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带来了新的工作和商业机会，民众和商界成员对签订何种项目或选择哪家公司实施项目没有话语权。与获取土地和环境相关的问题对乌干达社区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各行为体必须认识到乌干达边缘化民众和冲突的历史，以及复杂且敏感的土地所有权。所有项目所需的土地必须以合法方式获取。出让土地的人们必须是在自由、知情且双方同意而非是被迫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且根据管控市场价格获得赔偿。对劳工权益保障缺乏、员工合同约束松散、企业忽视社会责任等问题的关切同样使得当地民众对“一带一路”投资产生负面观感。除非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一带一路”将会经历更多挫折，并且最终导致现有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以及歧视和暴力行为的进一步升级。

八, 结论

就本报告涉及的四个案例和地区而言，“一带一路”对当地冲突环境的影响似乎褒贬混杂。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有价值的外国投资和实实在在的项目。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冲突历史、政治的不稳定以及资本的匮乏，它们通常很难获得类似的投资和项目。由于和传统渠道相比具有更高的风险认受度，同时也作为这些国家通常可以企及的唯一选择，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融资已经成为冲突环境下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尽管我们尚无法对“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带来长远的发展惠益进行评估，但其在推动地区互联互通、电力供给和工业化等几个关键方面的确具有令人鼓舞的切实成果。

另一方面，由“一带一路”建设引入的新资源如何分配也成为主要争议点之一，尤其是如何应对各国社会内部既有冲突各方之间的分歧。广大精英和势力强大的选区似乎可以稳稳当当的获利，而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将处于不利地位。“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通常与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保持一致，从而反映中央政府的优先政策方向。相比之下，边缘地区的利益关切难以得到周全的照顾。包括瓜达尔港、瑞丽-曼德勒铁路在内的许多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就没有和当地民众进行充分协商，有时候甚至是在民众的抵制中强行推进。在当地经营的中国公司并未有组织地被鼓励将自身理解成为艰难政治环境中的重要行为体。相反，它们常常在中国政府和所在国中国使馆的明确授意下，尽可能把自己与当地环境区隔开来，同时坚守“不干涉”这个越来越不现实的理念。这就使它们无法与当地社区进行真正的接触。即便一些公司尝试这样做，也常被认为是单纯的形象工程。

虽然本报告中的四个案例都提到了具体的挑战，但仍有可能通过相应的实践以改善这些案例中普遍存在的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当地民间社会行为体视作项目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从最初的早期影响评估入手，邀请它们参与项目全周期各阶段的规

划与实施。这并不仅仅是增强当地民众对“一带一路”项目归属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能帮助项目承包商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环境，并获取可信的中介来传播与项目有关的信息。

其次，活跃在冲突环境下的中国企业应当尽快加强它们的冲突分析能力，致力于培养更好的冲突敏感意识。敏锐地感知业务开展地区的复杂环境，以及其投资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加剧或缓解当地社会的紧张关系，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并不仅是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同时也会提升中国投资的安全性和长期可行性。

许多其他的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一带一路”项目缺乏透明度的问题，但在社会团体间缺乏互信、政府合法性较低的冲突环境下，透明度问题就显得犹为相关了。由于涉及项目本质的贷款协议程序模糊不清且高度机密，同时项目协商又聚焦于双边高层之间，这就使确保“一带一路”项目公平且可持续实施的重任直接转移到了国家政治体制之上，而各国的政治体制对此往往无法实现。显然，这需要通过提高项目透明度、建设可靠的信息平台以及开展独立监督等途径加以改善。

最后，更加着重聚焦当地民生问题将有助于减少各国地方层面对“一带一路”项目的不满和抵制。那些呼应国家层面发展计划的项目可能会地方产生高度集中的不利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几个问题包括破坏环境、攫夺土地以及就业机会的不稳定或压榨性。同样，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积极的对外沟通并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协商加以应对。

上述改进措施中的大多数必须由中国和当地行为体进行协商来达成。正如作者在案例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一带一路”项目的成果尽管会受到中方的重大影响，但并非由中国一家来支配。建设更具包容性和冲突敏感性的“一带一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理想的话，这在更大程度上同样应该让国际伙伴参与进来，包括在脆弱环境下具有运作经验的发展机构、能够为冲突动态提供深刻观察的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实操性冲突敏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等。而这也需要各方的态度转变，即中国要有更强的意愿让“一带一路”建设接受各方监督，接纳相对独立的行为体参与共建。而对于西方政府和其他外部行为体而言，则应集中精力进行以事实为基础的建设性介入，而不是条件反射式的一味拒绝。在寻求向更加稳定和繁荣社会过渡的冲突环境中，“一带一路”建设已然成为重要一个因素。努力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项目，应当成为各利益攸关方的共同目标。

Aamir, Adnan (2018). The Balochistan Insurgency and the Threat to Chinese Interests in Pakistan.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19(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balochistan-insurgency-and-the-threat-to-chinese-interests-in-pakistan/

Aamir, Adnan (2019). The Myth of CPEC's Western Route. The Friday Times, November 8, 2019. https://www.thefridaytimes.com/the-myth-of-cpecs-western-route/

Abb, Pascal (2016). China's new think tank diplomacy. ECFR China Analysis, August 2016.

Acker, Kevin, Deborah Brautigam and Huang Yufan (2020). Debt relief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Africa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39.

Afzal, Madiha (2020). "At all costs": How Pakistan and China control the narrative on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Brooking report, June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t-all-costs-how-pakistan-and-china-control-the-narrative-on-the-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

Ahmed, Zahid Shahab (2019) Impact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on Nation-Building in Pakist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117), 400 – 414.

Alden, Chris and Ana Alves (2009). China and Africa's natural resources: The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SAIIA Occasional Paper 41.

Ascensão, Fernando, et al (2018).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ture Sustainability 1(5), 206 – 209.

Bandiera, Luca and Vasileos Tsiropoulos (2019). A framework to assess debt sustainability and fiscal risk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891.

BBC (2018). Uganda country profile. May 10, 2018.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4107906

BBC (2019). Aung San Suu Kyi's Myanmar dam dilemma with China. July 26, 2019.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48857781

BBC (2021). Myanmar coup: Aung San Suu Kyi faces new charge amid protests.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56074429

Benabdallah, Lina (2016). Towards a Post-Western global governance? How Africa-China relations in(form) China's practices.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1(1), 135 – 145.

Bluhm, Richard, Axel Dreher, Andreas Fuchs, Bradley Parks, Austin Strange, and Michael Tierney (2018). Connective Financing: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the Diffus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idData Working Paper #64. Williamsburg, VA: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Brautigam, Deborah (2009). Ai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meet the OECD-DAC aid regi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3(5), 752 – 764.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2020). Uganda: Employers’ federation takes steps to support Chinese entrepreneurs understand local laws and culture to reduce conflict with locals, incl. employees. November 9, 2020.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uganda-employers-federation-taking-steps-to-support-chinese-investors-understand-local-laws-and-integrate-culturally-to-reduce-conflict-with-locals-incl-employees/

Chen, Yunnan (2020). Railpolitik: the strengths and pitfalls of Chinese-financed African Railways. Panda Paw Dragon Claw, March 16, 2020. https://pandapawdragonclaw.blog/2020/03/16/railpolitik-the-strengths-and-pitfalls-of-chinese-financed-african-railways/.

China Daily (2017). Full text of Xi Jinping’s report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October 18, 2017.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19thcpcnationalcongress/2017-11/04/content_34115212.htm.

China Daily (2019). SOEs bring integ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pril 28, 2019. http://www.china.org.cn/business/2019-04/28/content_74730284.htm.

CIVICUS (2018). Uganda: shocking violence against protesters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 August 22, 2018. https://www.civicus.org/index.php/media-resources/news/3407-uganda-shocking-violence-against-protesters-requires-urgent-attention

Clapp, Priscilla (2020). The Intersection of Investment and Conflict in Myanma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February 18, 2020.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0/02/intersection-investment-and-conflict-myanmar

CSIS (2019). Reconnecting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https://reconasia.csis.org/about/.

Daily Monitor (2019). Jinja expressway project rocked by bribery claims. November 26, 2019. https://www.monitor.co.ug/uganda/news/national/jinja-expressway-project-rocked-by-bribery-claims-1861384

Deloitte (2019).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Commerc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vestment Index Report 2018. https://www2.deloitte.com/cn/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pr-2nd-belt-and-road-countries-investment-index-report.html.

Dollar, David (2018). Is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a challenge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3, 283 – 298.

Economist (2021). Uganda's violent election has exposed divisions of age and class. January 16,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1/01/16/ugandas-violent-election-has-exposed-divisions-of-age-and-class

Ekman, Alice (ed., 2019). China's Belt and Road and the world: competing forms of globalization. Paris: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UCCC (2020).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European involvement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20.

Fallon, Theresa (2015). The New Silk Road: Xi Jinping' s Grand Strategy for Eur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37(3), 140 – 147.

Ferchen, Matt and Anarkalee Perera (2019). Why unsustainable Chinese infrastructure deals are a two-way street.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July 23, 2019.

Ferdinand, Peter (2016). Westward ho—the China dream and 'one belt, one roa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9), 942 – 957.

Fergana News Agency (2019). Former Kyrgyz PM sentenced to 15 years over power station affair. December 6, 2019. https://en.fergana.news/news/113153/

Furlong, Ray (2020). Upheaval In Kyrgyzstan Follows Two Revolutions This Century.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October 8, 2020. https://www.rferl.org/a/upheaval-in-kyrgyzstan-follows-two-revolutions-this-century-/30882185.html

Gong, Xue (2020). Understan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Myanmar: A Socio-Politico and Economic Approach. China and the World Vol. 03, No. 04, 2050016, 2020. https://doi.org/10.1142/S2591729320500169

Haider, Mehtab (2020). NA panel passes CPEC Authority bill with majority. The News, November 18, 2020. https://www.thenews.com.pk/print/745244-na-panel-passes-cpec-authority-bill-with-majority

Hameed, Maher (201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4, 64.

Helsingen, Hanna; Milligan, Ben; Dailey, Michele and Bhagabati, Nirmal. (2017) Green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Myanmar, Myanmar.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September, 2017. http://d2ouvy59p0dg6k.cloudfront.net/downloads/BRI_Final_Digital_090118.pdf

Hillman, Jonathan (2020). The emperor's new road: China and the project of the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Hussain, Ejaz and Muhammad Furqan Rao (2020).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3, 453–472.

Imanaliyev, Muratbek (2020). Drawbacks of China-Kyrgyzstan relations. CABAR Asia. April 27, 2020. https://cabar.asia/en/drawbacks-of-china-kyrgyzstan-relations

Imanaliyeva, Ayzirek (2020). Kyrgyzstan: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a sleeping Chinese oil refinery. Eurasianet. October 22, 2020.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living-in-the-shadow-of-a-sleeping-chinese-oil-refinery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20). Commerce and Conflict: Navigating Myanmar’s China Relationship. March 30, 2020.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east-asia/myanmar/305-commerce-and-conflict-navigating-myanmars-china-relationship

Irrawaddy (2019). Interview: A Kachin Leader Speaks on Peace, Federalism and the Course of Myanmar Politics. December 11, 2019. https://www.irrawaddy.com/in-person/interview/kachin-leader-speaks-peace-federalism-course-myanmar-politics.html

Jafri, Aun Ali (2020). Pakistan. In: BRI Through My Village, Asian Peoples’ Movement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2020.

Jahns, Henriette, Malin Emmerich, Marjan Stojiljkovic, Slavisa Jelisic, Sebastian Rink and Karsten Löffler (2020). Greening BRI projects in the Western Balkan countries. Frankfurt School/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 2020. https://www.fs-unep-centre.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2020-11-02_FS-UNEP-Centre_Greening-BRI-projects-in-Western-Balkan-Countries_study.pdf

KABAR (2019). China expresses serious concern over Salton Sary incident – embassy. August 7, 2019. http://en.kabar.kg/news/china-expresses-serious-concern-over-salton-sary-incident-embassy/

Kapoor, Kanupriya and Min Thant, Aye (2018). Exclusive: Myanmar scales back Chinese-backed port project due to debt fears – official. Reuters. August 2,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yanmar-china-port-exclusive-idUSKBN1KN106

Khan, Reza (2016). 15,000 troops of Special Security Division to protect CPEC projects, Chinese nationals. Dawn, August 12, 2016. https://www.dawn.com/news/1277182

Kiani, Khaleeq (2017). Power consumers to pay security cost of CPEC projects. Dawn, August 5, 2017. https://www.dawn.com/news/1349492/power-consumers-to-pay-security-cost-of-cpec-projects

Kynge, James (2014) Uganda turns east: Chinese money will build infrastructure says Museveni.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1, 2014. https://www.ft.com/content/ab12d8da-5936-11e4-9546-00144feab7de

Laruelle, Marlène and Royce, Dylan (2020). Kennan Cable No. 56: No Great Game: Central Asia's Public Opinions on Russia, China, and the U.S. Kennan Institute, Wilson Center. August, 2020.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kennan-cable-no-56-no-great-game-central-asias-public-opinions-russia-china-and-us

Lei Mon, Swe (2020). Tatmadaw, KIA skirmishes break out in Shan. Myanmar Times. June 8, 2020. https://www.mmtimes.com/news/tatmadaw-kia-skirmishes-break-out-shan.html

Lin, Justin Yifu and Wang Yan (2013). Beyond the Marshall Plan: A Glob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und. Background research paper for the UN High Level Panel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Liu, Haimeng, Hu Senlin, Fang Kai, He Guangqiang, Ma Haitao and Cui Xuegang (2019).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Geographical Research 38(12), 1 – 19.

Liu, John (2020). Xi to sign deal on Kyaukphyu SEZ during Myanmar visit – Chinese ambassador. Myanmar Times. January 14, 2020. https://www.mmtimes.com/news/xi-sign-deal-kyaukphyu-sez-during-myanmar-visit-chinese-ambassador.html

Lo, Nicholas (2019). Trouble for Belt and Road in Myanmar. China Dialogue. October 21, 2019. https://chinadialogue.net/en/business/11585-trouble-for-belt-and-road-in-myanmar-2/

Lwanga-Lunyiigo, Samwiri (1987). The colonial roots of internal conflict in Uganda.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Internal Conflict, Paper 17. 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87.

Lwin, Nan (2019). Infographic: 30 Years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Myanmar. The Irrawaddy. January 25, 2019. https://www.irrawaddy.com/specials/infographic-30-years-chinese-investment-myanmar.html

Mark, SiuSue, Overland, Indra and Vakulchuk, Roman. (2020). Sharing the Spoils: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Myanmar.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9(3), pp. 381–404. doi: 10.1177/1868103420962116.

Markey, Daniel (2020). China's western horizon: Beijing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ur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Mayers, James and Barungi, Julian (2019). Chinese investment in Uganda: new impetu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January, 2019. https://pubs.iied.org/sites/default/files/pdfs/migrate/17493IIED.pdf

McCarthy, G (2020). Class dismissed? Explaining the absence of economic injustice in the NLD’s governing agenda.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8(3): 358–380. https://doi.org/10.1177/1868103420911320

Mogilevskii, Roman (2019). Kyrgyzsta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2019.

Musoke, Ronald (2020). Chinese investors face culture shock in Uganda. The Independent. November 5, 2020. https://www.independent.co.ug/chinese-investors-face-culture-shock-in-uganda/

Myanmar Times (2021). China addresses rumours, urges Myanmar to settle political differences. February 16, 2021. https://www.mmtimes.com/news/china-addresses-rumours-urges-myanmar-settle-political-differences.html

Najam, Adil and Faisal Bari (2017). Pakista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Report. Islamabad: UNDP Pakistan.

Noorani, Ahmad (2016). CPEC route controversy routed. The News, January 16, 2016. https://www.thenews.com.pk/print/90708-CPEC-route-controversy-routed

Obwona, Marios; Guloba, Madina; Nabiddo, Winnie and Kilimani, Nicholas (2007). China-Africa economic relations: The case of Uganda.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AERC), September, 2007.

OECD (2020).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Hotspot Analysis and Needs Assessment. Chapter 5: Investment in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n the Kyrgyz Republic.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8b30e9f8-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8b30e9f8-en

Oluka, Benon (2016). Govt gives Chinese firm 2,500 acres in Luweero for farming. The Observer. May 2, 2016. https://observer.ug/news-headlines/44019-govt-gives-chinese-firm-2-500-acres-in-luweero-for-farming

Oryem, Robin (2020). Xenophobia and behavioural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Uganda. May 1, 2020. https://blogs.lse.ac.uk/africaatlse/2020/05/01/xenophobia-racism-ebola-behavioural-change-covid19-uganda/

Oxus Society (2020). Central Asia Protest Tracker. https://oxussociety.org/viz/protest-tracker/ Accessed online 30 November 2020.

Pannier, Bruce (2020). Lack Of Justice Hampers Reconciliation In Southern Kyrgyzstan 10 Years After Deadly Ethnic Clashes.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June 16, 2020. https://www.rferl.org/a/lack-of-justice-hampers-reconciliation-in-southern-kyrgyzstan-10-years-after-deadly-ethnic-clashes/30673852.html

Roberts, Harry (2019). The China-Kyrgyzstan-Uzbekistan Railway Project: How Much Does Kyrgyzstan Stand to Benefit? Cabar Asia. August 4, 2019. https://cabar.asia/en/the-china-kyrgyzstan-uzbekistan-railway-project-how-much-does-kyrgyzstan-stand-to-benefit

Rolland, Nadège (2017). 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7.

Rudyak, Marina. Who is who in the Chinese lending institutional landscape. Urgewald e.V., 2020. https://urgewald.org/en/shop/who-who-chinese-lending-institutional-landscape.

Russell, Daniel and Blake Berger (2019). Naviga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2019.

Saferworld (2020). Strengthen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equal access to resources in Uganda. November, 2020.

Saferworld (2021). Land Governance. January 2021. https://www.saferworld.org.uk/uganda/land-governance [Accessed January 25, 2021]

Sandhi Governance Institute (2019).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Monitor: Case Study of the Myitky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Project. November, 2019. https://sandhimyanma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MEDZ-PPP-Monitoring-Report.pdf

Scissors, Derek (2019).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9.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Shah, Syed Ali (2015). Economic corridor: ANP denounces change in route, calls APC. Dawn, May 1, 2015. https://www.dawn.com/news/1179361

Shahid, Kunwar Khuldune (2020). Asim Bajwa Exposé Underlines the Corruption Linking the Pakistan Army and CPEC. The Diplomat, September 4,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asim-bajwa-expose-underlines-the-corruption-linking-the-pakistan-army-and-cpec/

Shaku, Kanat (2020). Wave of attacks on foreign owned gold mines amid Kyrgyzstan's political upheaval. Intellinews. October 7, 2020. https://www.intellinews.com/wave-of-attacks-on-foreign-owned-gold-mines-amid-kyrgyzstan-s-political-upheaval-193554/

Shan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2020). Press release: Indiscriminate shelling, torture, looting by Burma Army during largescale offensive against RCSS/SSA in southern Kyaukme. Progressive Voice Myanmar. October 19, 2020. https://progressivevoicemyanmar.org/2020/10/19/indiscriminate-shelling-torture-looting-by-burma-army-during-large-scale-offensive-against-rcss-ssa-in-southern-kyaukme/

Sial, Safdar (2016). CPEC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 2016. In: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16, Pakistan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2016.

Sina Finance (2020).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image survey report 2020 (*zhongguo qiye haiwai xingxiang diaocha baogao* 2020).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20-11-04/doc-iiznezxr9916287.shtml

Statista (2021). Uganda: Age structure from 2009 to 2019. January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47698/age-structure-in-uganda/ [Accessed January 25, 2021]

Sun, Yun (2017). China and Myanmar’s Peace Proces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March 9, 2017.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7/03/china-and-myanmars-peace-process

Swaine, Michael (2015). Chinese views and commentary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47(2), 3.

Sze Wan Chan, Debby (2017) Asymmetric bargaining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in the Myitsone Dam controversy: social opposition akin to David’s stone against Goliath, The Pacific Review, 30:5, 674 – 691, DOI: 10.1080/09512748.2017.1293714

Tan-Mullins, May (2014).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s in Chinese extractive industrie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3, 4, 19–39.

Van der Kley, Dirk (2020). China diversifies in Central Asia. Eurasianet. November 23, 2020. https://eurasianet.org/china-diversifies-in-central-asia

Waseem, Mohammed (2011).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Pakistan: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Brookings Working Paper No. 5, January 2011.

Wingo, Scott (2019). China in Uganda: The Highs and Lows of the Belt and Road. Center for Advanced China Research. June 27, 2019. https://www.ccpwatch.org/single-post/2019/06/27/China-in-Uganda-The-Highs-and-Lows-of-the-Belt-and-Road

World Bank (2020). Kyrgyz Republic.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kyrgyz-republic?view=chart Accessed online 30 November 2020.

Xinhua (2018). Uganda adopts China’ s industrial park model to fast track dev ’ t. September 23, 2018.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9/23/c_137486811.htm

Xinhua (2020). Industrial park with Chinese investments in Uganda contributes to industrialization. October 20,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africa/2020-10/20/c_139452361.htm

Yan, Xuetong (2014).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2): 153 – 184.

Yau, Niva and van der Kley, Dirk (2020). The Growth, Adapt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Chinese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in Central Asia. The Oxus Society. October 13, 2020. https://oxussociety.org/the-growth-adaptation-and-limitations-of-chinese-private-security-companies-in-central-asia/

Zhou, Taidong (2019). Align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Myanma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December 19, 2019. https://doi.org/10.19088/1968-2019.139

艾沛思 // 罗伯特·斯威恩 // 伊利亚·琼斯

“通往和平之路”还是争议的焦点：“一带一路”倡议对冲突国家的影响

自2013年中国宣布建设“一带一路”以来，这一重要倡议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此类关注焦点涵盖了其对从经济一体化到地缘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影响。然而，尽管这一倡议相关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高度脆弱和容易发生冲突的环境，但“一带一路”项目所涉及的和平与安全影响却较少受到关注。本报告聚焦于“一带一路”项目及它们对以下四个国家的冲突动态所带来的变革型影响：巴基斯坦、缅甸、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干达。报告亦就如何改进当地成果和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些切实建议。

艾沛思(Pascal Abb) 是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国内冲突”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斯威恩 (Robert Swaine)是更安全世界(Saferworld)的中国项目协调员。伊利亚·琼斯 (Ilya Jones)是更安全世界的中亚区域冲突和安全顾问，为其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项目团队提供支持。

ISBN 978-3-946459-64-4

SAFERWORLD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BUILDING SAFER LIVES

50 YEARS
PRIF HSFK

Leibniz
Association